



复旦宋代文学研究书系 第二辑

王水照 主编

苏轼苏辙研究

朱刚 著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五
穎濱先生

策

禹之所以通水之法

天下之有五材猶人之有五臟六腑也生而壽夭疾病之變皆其所為也故一人之身養之有道而無飲食喜怒之傷則無憂乎壽命之不長養之而不得其道治之而不得其法則反以為害於吾身蓋古者五材之用於天下莫不有惠幸而甘得聖人以治之故至于今而無傷今之天下知夫江淮之所以流山川之所以安草木之所以生兵刃之所以割人之所以茹毛飲血者何也安知夫聖人備其穀以治五行五材之難也五材之中其至柔者易凌抑而不畏之者好以敗壞天下故堯之時水猶通行泛濫於天下得禹而後能止方禹之治水也而治何尤難以為禹之所從來者高下分其勢以殺其怒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复旦宋代文学研究书系 第二辑

王水照 主编

苏轼 苏辙研究

朱
刚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轼苏辙研究/朱刚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9. 6
(复旦宋代文学研究书系第二辑/王水照主编)
ISBN 978-7-309-14186-3

I. ①苏… II. ①朱… III. ①苏轼(1037-1101)-文学研究
②苏辙(1039-1112)-文学研究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37119 号

苏轼苏辙研究

朱 刚 著

责任编辑/王汝娟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出版部电话: 86-21-65642845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5.125 字数 360 千

2019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4186-3/I · 1134

定价: 7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复旦宋代文学研究书系第二辑序

王水照

2013年,我们推出了“复旦宋代文学研究书系”第一辑,这套“书系”承袭我所编“日本宋学六人集”而来,可谓“六人集”的国内版。其中选入六部中青年学者的著作,作者都是我的学生。“书系”出版后,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同年12月,我们在复旦大学召开了新书座谈会,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高校的同行,就这套书做了一次集中评议,讨论评述了“书系”的学术价值和相关问题,评议成果陆续在各类期刊发表。同时,在这次座谈会参与人员的基础上,这批中青年学者又联络同道,互相砥砺,相约成立了宋代文学同人读书会,编辑《宋代文学评论》专刊。“书系”的积极效应显现,影响力也明显扩大,获得了第十二届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集体),其中两部著作又获得了教育部第七届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三等奖。这些都说明,我在第一辑序言中许下的“精选几部著作,形成一个品牌”的愿望,得以部分实现。

当然,要真正“形成一个品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只有坚持标准,持续发力,才可能得到大家广泛认可。我们秉持“文化—文学”的学术思路,在强调文学本位的同时,注重交叉型课题的研究,以拓宽研究视野和研究路径,期能在得出具体论断之外,也为学界提供一些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上的启示。职是之故,我们又精心遴选,推出

了第二辑。本辑在学术理念上,与第一辑一脉相承。比如本辑陈元锋《北宋翰林学士与文学研究》一书,是其博士学位论文《北宋馆阁翰苑与诗坛研究》的姊妹篇,两书研究角度都聚焦于“制度与文学”这一交叉型课题。书中全面讨论了北宋翰林学士的政治文化职能,以及他们主持文坛所形成的文学图景,突出了翰林学士在文学集团中的领袖作用,拓展了我们对北宋文学的认识。他提到交叉型课题要避免使文学沦为历史文化研究的附庸,这是我在第一辑序言中也着重强调过的。又如朱刚的《苏轼苏辙研究》,是作者长期钻研唐宋八大家的重要成果,与第一辑的《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形成互补,加深了我们对苏氏兄弟文学、文献和行迹的认识,丰富了北宋士大夫文学的面相。再如侯体健的《士人身份与南宋诗文研究》,标题拈出“士人身份”一词,这在第一辑《刘克庄的文学世界——晚宋文学生态的一种考察》中,就已是全书的关键词之一;而戴路《南宋理宗朝诗坛研究》也主要从不同的诗人身份入手,架构全文。这都充分显示出本辑和第一辑内在的延续性。

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本辑较第一辑又有一些新的变化,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近年来宋代文学研究整体格局的调整,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研究时段后移,南宋文学逐渐被大家所重视。第一辑的研究重心在北宋,除了侯体健一书是论南宋刘克庄,其他几部都是讨论北宋的文学现象,像朱刚《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李贵《中唐至北宋的典范选择与诗歌因革》两部还是从中唐谈起的。本辑论题在时段上则以南宋为主,侯体健《士人身份与南宋诗文研究》、戴路《南宋理宗朝诗坛研究》、王汝娟《南宋“五山文学”研究》书名都明确标示出南宋,赵惠俊《朝野与雅俗:宋真宗至高宗朝词坛生态与词体雅化研究》也有半部涉及南宋。侯体健在引言中还提出了“作为独立研究单元的南宋文学”的理念,更是显示出作者对南宋文学的特别关

注。十多年前,我曾指出宋代文学研究存在“三重三轻”(重北宋轻南宋、重词轻诗文、重大作家轻中小作家)的偏颇。经过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这些偏颇现在都得到不同程度的纠正,宋代文学研究格局日益合理。我认为南宋文学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个独立的发展阶段,呈现出诸多重大特点:文学重心在空间上的南移,作家层级下移,文体文风由“雅”趋“俗”,文学商品化的演进与文学传播广度、密度的加大等,都具有里程碑式的转折意义。我们应该在文学领域积极推动“重新认识南宋”这一课题的深入。侯体健、戴路、王汝娟的著作,可以说是对这个课题的初步探索与回应。

二是论题的综合性趋强,所涉文体论域更广。宋代是我国文学样式、文人身份、文体种类最为丰富的历史时期之一,要全面展现这个时代的文学图景,就必须多层次、多视角、多维度地观照。第一辑主要集中于以欧、苏为代表的士大夫文学,即使是刘克庄这样的文人,也多具士大夫色彩;文体上则偏重诗歌,如李贵论典范选择、金甫曝论苏轼“和陶”、成玮论宋初诗坛都是讨论宋诗之作。第二辑论题就明显广泛一些:从身份来看,除了依然关注翰林学士、苏轼兄弟之外,江湖诗人、地方文人、禅僧诗人被着重提出来讨论,在好几部书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从文体来看,诗文虽然仍是重点,但又添入赵惠俊关于词体雅化一书,可谓弥补了第一辑宋词缺席的遗憾,而且讨论宋代骈文的篇幅明显增加,侯体健、王汝娟的著作都有专章专节研讨“宋四六”;从研究模式来看,个案研究明显减少,时段研究、专题研究增多,出现了“翰林学士与文学”、“理宗诗坛”、“五山文学”、“词的雅化”等具有学术个性的专题,等等。这从侧面反映出当前宋代文学研究已经进入新的阶段。突破个案局限,走向更具挑战性的综合研究,成为大家共同的选择。这自然也对作者的知识结构、学术视野和资料搜集解读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是尝试提出新视角与新概念,显示出学理性建构的努力。本

辑的一些研究视角,都是以前研究比较少见或多有忽视的,比如陈元锋从翰林学士角度切入讨论北宋文坛,戴路以诗人身份属性分疏理宗诗坛,赵惠俊重构词体雅化脉络等,前人都未特别措意,他们却能独出机杼,另辟蹊径,提供了有意义的研究视角。另外还有一些新概念被提出来,如王汝娟使用南宋“五山文学”,这是受到日本五山文学的影响而自创的概念。我们知道,日本之所以有“五山十刹”之称,本就是受到南宋寺庙规制影响,然而南宋禅宗文学并无专门指称,现在再“由日推中”,借用为南宋“五山文学”以代指南宋禅僧文学,是具有学理意义的。侯体健则提出“祠官文学”,以统称那些领任祠禄官的宋代士人表达祠官身份和志趣的文学作品,并认为是一窥南宋文人心灵世界的重要视角,也颇有启发意义。这些新的概念能否为大家所接受并获得进一步的讨论,自然有待时间的检验,但它们确实有助于我们思考当前宋代文学研究如何拓展视野,更新路径,以获得长足发展。

其他像陈元锋对翰林学士制诰典册的解读、朱刚对审刑院本《乌台诗案》的分析、侯体健对南宋骈文程式的讨论、王汝娟对日本所存禅宗文献的利用、戴路对晚宋士大夫诗人群体的挖掘、赵惠俊对词作的细读及“雅词”的辨析等具体的创获还很多,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宋代大儒朱熹有云“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本辑所收著作既有对旧题的再讨论、再补充、再纠正,也有自创新题的开拓与建构,邃密深沉,两兼其美,展现出宋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求新面貌和广阔前景。

本辑呈现的变化,既是大家不甘守旧、努力创新的结果,也是学界新生力量不断成长的必然。第一辑的作者以出生于60、70年代为主,这一辑则已然是80、90后占绝对优势;而且他们中间有几位是我学生的学生,戴路是吕肖奂的博士,赵惠俊是朱刚的博士,王汝娟也曾随朱刚读研。学术事业,薪火相传,这是作为老师的我非常乐

意也非常期盼见到的,希望他们能够戒骄戒躁,再接再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最后,我还想借此机会诚邀全国优秀的中青年学者加入我们,只要认同我们的学术理念,符合我们所追求的学术品格,就欢迎加盟,以推出第三辑、第四辑、第五辑……真正让“复旦宋代文学研究书系”成为学术共同体广泛认同的品牌。

目 录

苏轼三讲

- 一 | 何处不归鸿
——苏轼的人生与诗 3
- 二 | 庐山真面目
——苏轼的禅悟 19
- 三 | 但愿人长久
——苏轼的处世态度 41

苏轼尺牍考辨

- 一 | 东坡尺牍的版本问题 65
 附论：关于《欧苏手简》所收欧阳修尺牍 83
- 二 | 苏轼与云门宗禅僧尺牍考辨 90
- 三 | 苏轼与临济宗禅僧尺牍考辨 122
- 四 | “小二娘”考
 ——苏轼《与胡郎仁修》三简释读 131
- 五 | 苏轼与滕达道尺牍考辨 142

“乌台诗案”研究

- 一 | “乌台诗案”的审与判
——从审刑院本《乌台诗案》说起 159
- 二 | 审刑院本《乌台诗案》校录 177

苏辙年谱订补

- 孔凡礼《苏辙年谱》订补 193

苏辙诗文研究

- 一 | 北宋学术的终结
——论苏辙晚年思想 291
- 二 | 箪瓢吾何忧,作诗热中肠
——论苏辙晚年诗 312
- 三 | 关于麻沙本《类编增广颖滨先生大全文集》 335
- 四 | 关于婺刻《三苏先生文粹》所载策论 337
附录: 苏辙佚文八篇 349
- 五 | 苏辙文章评析 356

苏轼三讲

苏轼三讲,始于2011年5月我为“中智杯上海青年人文经典读书工程”所作的“走近苏轼”系列讲座。此后,我继续用这三讲的形式,在多种场合向各类听众介绍苏轼,当然有时候不需要三讲,只选择其一,内容上则不断有所修订。第一讲《何处不归鸿——苏轼的人生与诗》以“鸿”、“牛”、“月”三个诗歌意象串联苏轼一生的感悟,其基本构思来自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唐宋四大家的道论与文学》(东方出版社,1997年),在我与导师王水照先生合著的《苏轼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中有较为详细的表述,这次收入本书,又加以扩充。第二讲《庐山真面目——苏轼的禅悟》,曾以《苏轼庐山之行及其“悟”》为题,撰成比较正式的论文,发表于《新宋学》第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三讲《但愿人长久——苏轼的处世态度》,曾被收录于“上海青年人文经典读书工程编委会”所编的《先典新识——名家人文与经典演讲录》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是一个经过整理的讲座记录稿。因此,这里提供的三讲文本,在语体上殊不统一,虽加修订,多仍其旧,请读者见谅。

一 何处不归鸿

——苏轼的人生与诗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也就是苏轼在世的最后一年,他从贬谪之地海南岛获赦北归,五月一日舟至金陵(今江苏南京),遇见老朋友法芝和尚,作《次韵法芝举旧诗一首》:

春来何处不归鸿,非复羸牛踏旧踪。但愿老师真似月,谁家瓮里不相逢。^①

作此诗后不久,七月二十八日苏轼病逝于常州。所以,诗里以“归鸿”自喻,读起来令我们有些伤感。但苏轼写下“何处不归鸿”的时候,似乎是喜悦的。当然除了“鸿”以外,接下来还有“牛”、“月”两个比喻。四句诗写了三个比喻,大抵直呈喻体,对喻义没有明确的阐说,这是因为苏轼相信对方即法芝和尚是能够看明白的。所以,在探讨喻义之前,我们先得搞清楚这位法芝是谁。

一、关于法芝

《苏轼诗集》注法芝“名昙秀”,这个注释不是太准确。当时确实

① 苏轼《次韵法芝举旧诗一首》,《苏轼诗集》卷四十五,中华书局,1982年。

有一位名为昙秀的和尚,而且曾在苏轼笔下出现,那是一位禅僧,即虔州廉泉昙秀,临济宗黄龙慧南禅师的法嗣。但我们读苏轼《虔州崇庆禅院新经藏记》^①一文可知,此僧在苏轼北归之前已经去世。所以这里的法芝不可能是廉泉昙秀。不过,有时候苏轼也确实把这位法芝称呼为“昙秀”,有时又称为“芝上人”,这样看来,他应当是名法芝、字昙秀。同时人贺铸的《庆湖遗老诗集》卷七,有一首《寄别僧芝》,自序云:

吴僧法芝,字昙秀,姓钱氏。戊辰(1088)九月,邂逅于乌江汤泉佛祠,将为京都之游,既相别,马上赋此以寄。^②

贺铸介绍的这一位法芝,才是《次韵法芝举旧诗一首》的写赠对象,其俗姓钱氏,可能是五代十国时吴越钱王的后代,苏轼在杭州时,与钱王的后人建立了很深的友谊^③。

孔凡礼先生编订《苏轼诗集》时,参校各种版本,把诗中“真似月”一语校改为“心似月”。今按苏轼《书过送昙秀诗后》云:

“三年避地少经过,十日论诗喜琢磨。自欲灰心老南岳,犹能茧足慰东坡。来时野寺无鱼鼓,去后闲门有雀罗。从此期师真似月,断云时复挂星河。”仆在广陵作诗送昙秀云:“老芝如云月,炯炯时一出。”今昙秀复来惠州见余,余病,已绝不作诗。儿子过粗能搜句,时有可观,此篇殆咄咄逼老人矣。特为书之,以满行囊。丁丑正月二十一日。^④

① 苏轼《虔州崇庆禅院新经藏记》,《苏轼文集》卷十二,中华书局,1986年。

② 贺铸《寄别僧芝》,《庆湖遗老诗集》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李国玲编《宋僧录》第999页(线装书局,2001年),将字昙秀与名昙秀的二僧合为一人,误。

④ 苏轼《书过送昙秀诗后》,《苏轼文集》卷六十八。

丁丑是绍圣四年(1097),苏轼贬居惠州,法芝前来看望,轼子苏过写了一首律诗送给法芝,里面有“从此期师真似月”一句。按苏轼的说明,这是因为苏轼从前送法芝的诗里已经把对方比喻为“月”。检“老芝如云月”之句,在苏轼《送芝上人游庐山》^①诗,作于元祐七年(1092),过了五年,苏过继续用这个比喻称许法芝。这样,再过四年后,苏轼又转用苏过的诗句赠予法芝,所以,文本上应该以“真似月”为是。

“真似月”与“心似月”有什么差别呢?都是把对方比喻成“月”,但“心似月”可以是第一次作这样的比喻,而“真似月”则表明已不是第一次,这是很重要的差别。在苏轼父子与法芝之间,这个比喻被反复使用,其喻义为双方所知晓,且不断地加深领会和沟通,借助于这个简单的意象,可以达成更为复杂曲折的交流。这一点值得强调,因为诗中另一个比喻“牛”,也曾出现在苏轼赠予法芝的《送芝上人游庐山》中,也是反复使用;至于“鸿”,在苏轼的作品中出现得更频繁,其含义亦必为法芝所了解。作为赠诗的接受者,这位方外友人能够明白“鸿”、“牛”、“月”三个比喻的意思,进一步说,它们连贯地呈现在一首诗里,则除各自的喻义外,其间也必能形成一条意脉。下文的目标就是依苏轼的生平和诗歌,来追索这条意脉。

二、苏轼诗词对“鸿”的书写

苏轼字子瞻,出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公元1037年1月8日),嘉祐二年(1057)进士及第,回家乡眉州为母亲守孝后,嘉祐六年(1061)再到京城开封府,参加了该年举行的制科考试,考中三等,授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他告别父亲苏洵(字明允)、弟弟苏辙(字子由),独自去凤翔上任,途中有著名的《和子由澠池怀旧》

^① 苏轼《送芝上人游庐山》,《苏轼诗集》卷三十五。

诗,开始了苏诗对“鸿”的书写: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自注:“往岁马死于二陵,骑驴至浥池。”)①

这可以视为苏轼生平中第一首影响深远的诗作,雪泥鸿爪一喻,至今脍炙人口。

然而,这雪泥鸿爪的喻义究竟为何,却费人寻思。简单地讲,就是太渺小的个体不由自主地飘荡在太巨大的空间之中,所到之处都属偶然。古人注释苏诗,多引北宋天衣义怀禅师(993—1064)的名言“譬如雁过长空,影沉寒水,雁无遗踪之意,水无留影之心”②来注释此句,认为苏轼的比喻是受了这禅语的启发。从时间上看,义怀比苏轼年长数十岁,苏轼受他的影响不无可能,但嘉祐年间的苏轼是否知道义怀的这段禅语,却也不能确定。我们且不管两者之间有否渊源关系,比较而言,潭底的雁影比雪上的鸿爪更为空灵无实,不落痕迹,自然更具万缘皆属偶然、本质都为空幻的禅意。不过,从苏轼全诗的意思来看,恐怕不是要无视这痕迹,相反,他是在寻觅痕迹。虽然是偶然留下的痕迹,虽然留下痕迹的主体(鸿)已经不知去向,虽然连痕迹本身也将在时间的流逝中渐渐失去其物质性的依托(僧死壁坏,题诗不见),但苏轼却能由痕迹引起关于往事的鲜明记忆,在诗的最后还提醒弟弟来共享这记忆。所以,义怀和苏轼的两个比喻虽然相似,但禅意自禅意,诗意自诗意,并不相同。禅意是说空幻、说无常;诗意却正好相反,说虽然人生无常,在这世上的行踪也偶然无定,留下的痕

① 苏轼《和子由浥池怀旧》,《苏轼诗集》卷三。

② 惠洪《禅林僧宝传》卷十一《天衣怀禅师》,《续藏经》本。

迹也不可长保,但只要有共享回忆的人,便拥有了人世间的温馨。这也许受了禅意的启发,但并不是禅,而是人生之歌。

当然,“鸿飞那复计东西”,此时的苏轼对于人生的感受,确是不由自主,充满偶然性的。从仕宦的实况来说,这样的感受将会延续一生,所以这个“鸿”的意象在他以后的诗词中也不断重现。直到他去世,苏辙在《祭亡兄端明文》中依然用“鸿”来比喻兄长的身世:“涉世多艰,竟奚所为?如鸿风飞,流落四维。”^①我们用这几句来移注雪泥鸿爪一喻,应该还是比较合适的,因为身世飘忽不定,所以一切境遇皆为偶值,无处可以长守,不能安定。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为官之人不能自主,一身随朝廷差遣而转徙,竟不知将来之于何地,则此身犹如寄于天地间,随风飘荡,而前途也如梦境一般不可预计。

人生固然是不可完全预计的,苏轼还在凤翔的时候,对他非常欣赏的皇帝宋仁宗去世了,其侄子宋英宗继位,改元治平;到治平三年(1067),父亲苏洵卒,苏轼、苏辙回乡守孝,其间宋英宗又去世了,宋神宗继位,改元熙宁;到熙宁二年(1069),守完孝的苏轼回到京城,迎面就撞见一件大事: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变法把北宋的政界撕裂为两半:支持变法的“新党”和反对变法的“旧党”。有许多原因使苏轼选择了反对立场^②,但宋神宗的支持使“新党”在“新旧党争”中占据了优势,这就使苏轼被迫离开朝廷,熙宁四年(1071)任杭州通判,熙宁七年(1074)任密州知州,熙宁十年(1077)任徐州知州,长期在地方上工作。由于作为地方官的他必须执行自己所反对的政令,心情必定是不好的,在当时所作的诗文中难免有些宣泄。这些宣泄引起了“新党”的注意,他们认为是恶意的讥讽,加以弹劾。正好王安石罢相,宋神宗改元元丰,亲自主持政

① 苏辙《祭亡兄端明文》,《栟城集·后集》卷二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② 我曾试图对这些原因加以概括和分析,请参考王水照、朱刚《苏轼评传》第四章,第337—350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